

·探索与争鸣·

体育跨国史的理论与方法

——兼与体育全球史比较

茹亚伟, 曾允菁, 刘波

(清华大学 体育部, 北京 100084)

摘要: 采用跨国史视角对现代体育进行研究, 弥补传统体育史研究的不足。体育跨国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否定“欧洲中心论”和“文明例外论”。通过探索体育跨国史研究的方法与实践, 表明从跨国视角审视体育项目发展、体育网络的构建、体育在地化的转译, 可以补充以往民族国家体育史研究的不足, 书写具有国际视野的民族国家体育史。针对学术界已有对体育全球史的理论探讨, 比较体育跨国史与体育全球史异同。研究认为, 通过对体育跨国史概念、内涵、价值的全面阐释, 中国学术界完全有能力构建体育跨国史话语体系, 掌握学术话语权, 这符合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培养具有世界眼光与胸怀的历史观。

关键词: 体育跨国史; 体育全球史; 现代体育; 欧洲中心论; 文明例外论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2)06-0001-09

Theories and methods for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ports

——A comparison with the global history of sports

RU Yawei, ZENG Yunjing, LIU Bo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Based The study analyses the modern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to make up for the drawback of traditional sports history. The significance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ports aim to deny "Eurocentrism" and "civilization exceptionalism". By exploring the methods and practices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ports, it is shown that the study of sports events development, sports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local sports translation from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can supplement the drawback of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nation-state perspective.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discussion on the global history of sports in the academic world,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ports and the global history of sports. It is concluded that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is fully capable of constructing the theoretical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ports and having the academic discourse through the comprehens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ports, which also meet the demand of cultivating the historical view with global vision for China's stepping into the world stage.

Keywords: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ports; global history of sports; modern sports; Eurocentrism; civilization exceptionalism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影响之下,跨国史作为一种新史学研究范式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受国际学术界影响,中国的跨国史研究探索悄然兴起。通过对欧美跨国史的学术史进行详尽梳理,学者认为

跨国史研究是包括人员、信息、资本、思想、制度等在内的跨越领土疆界流动与联系的历史。尽管学术界对跨国史的含义、研究对象、研究时空范围依然存有争议,但大体来讲主要形成两种研究取径:其一,将

收稿日期: 2022-07-20

作者简介: 茹亚伟(1987-),女,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体育史。E-mail: ruyawei@hotmail.com 通信作者: 刘波

其作为民族国家范式的补充视角；其二，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关注跨国空间的历史经验，考察跨国现象与联系，逐渐形成新的史学分支^[1]。跨国史取径的独特之处在于，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跨国视角补充民族国家历史叙事。因此，跨国史研究并非否定以往研究，否认民族国家的历史价值与贡献，而是对现有历史叙事进行补充，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丰富国别史研究，使历史学研究更富有活力。

现代体育凭借其跨文化、跨国传播的属性，具有采用跨国史研究的天然优势。体育跨国史并非要消解民族国家体育史叙事，而是用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补充以往体育国别史研究的不足，还原更加真实的历史，为全球化时代书写具有国际视野的体育史提供路径。目前，国际体育史学界已经开始在研究中引入跨国视角，但理论与方法依然处于探索阶段，而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研究动向尚未关注。通过对体育跨国史概念、内涵、价值的全面阐释，中国学术界完全有能力构建体育跨国史话语体系，掌握学术话语权。

1 体育跨国史提出的背景

1.1 跨国史研究范式的兴起

西方史学自 19 世纪起逐步形成了系统研究和有教育规范的一门学科。林恩·亨特^[2]认为：“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同 19—20 世纪民族主义的共生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它为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份以往一直被限制或忽视的遗产。即便是最悠久的民族国家，诸如英国与法国，也起到了加强身份认同的作用”。但碍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造成了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即“欧洲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立场使西方对外扩张、宣扬民族国家“优越性”的内容成为历史叙事主流，漠视西方与外界交往，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历史演进的历史事实。研究内容上，注重政治史、关键领袖和重大事件的历史，忽视经济、社会、科学文化演进的历史和普通大众的历史。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社会科学和哲学迅速发展，国际考古学、人类学新成果的涌现，20 世纪上半叶出现一批突破传统民族国家视角，探究整体世界史的研究成果^[3]。这些学者和著作形成全球史学术研究共同体。受全球史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倡导以超越“民族-国家”范式对美国史和国际关系史展开研究。

以伊恩·蒂勒尔、托马斯·本德、入江昭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跨国史进行有益探索。1991 年蒂勒尔^[4]在《国际史时代的美国例外》中提出，要采用跨国史的视角克服以往民族国家框架下美国史研究的例外论。2000 年本德执笔的《拉比埃特拉报告》在跨国史

研究领域具有的里程碑意义，报告提出在全球化时代重新书写美国史的重大议题，肯定了在美国史研究以及教学中补充跨国视角的重要性^[5]。2006 年本德出版《万国一邦：美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成为用跨国史进行民族国家历史书写的典范。正如本德^[6]所言：“民族国家并非决然独立、封闭自足的；它跟其他各种人类团结(的形式)一样，不仅与外部相关联，也或多或少地被自身之外的环境所塑造。事到如今，(我们)不应再忽略(这种观察)民族国家史的显而易见的维度了。”2009 年入江昭编写的《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词典》出版，来自全世界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 350 名学者为之撰稿，就 9 种跨国现象达成学术共识^[7]，标志着跨国史研究已经被国际学术界接受，确立了其研究地位。

1.2 弥补“民族-国家”体育叙事的不足

在全球化时代，传统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出现以下不足：其一，研究视域狭窄，忽视跨国活动以及社会边缘群体；其二，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三，过分强调一国经验与制度的特殊性，低估民族国家与外界交往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8]。简言之，在全球化时代暴露出传统研究范式的不足，推动了历史学者对国家和历史的思考，他们试图将历史学从自 19 世纪以来形成的一成不变的“民族-国家”框架中“解放”出来。

体育跨国史的概念脱胎于跨国史学术范式。目前，学术界针对“体育跨国史”的概念未有明确定义。从目前已有的采用跨国史范式对体育研究的成果看，体育跨国史关注跨国体育交往对民族国家体育的影响，即外来体育在地化过程与结果。具体而言，体育跨国史旨在阐释外来体育对民族国家在体育观念、制度、文化上产生的深远影响。由于受传统史学范式的影响，国家疆界之内的体育国别史书写是目前学界主流。在以往体育史叙事中，以“民族-国家”为本位，造成两种缺陷：其一，忽视外来力量对本土体育的塑造作用；其二，缺少社会视角，即现代体育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究竟如何在异域落地、生根、传播，最终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手段与符号。

随着跨国史视角的引入，一些国别体育史研究开始增加外来体育传入以及在地化的内容。阿伦·古特曼与李·汤普森^[9]合著的《日本体育：一部历史》将日本体育以“黑船”开埠为时间分界点，分为前现代与现代两个历史阶段。现代时期，绝大部分日本民众将西方体育在日本的繁荣视为理所应当。事实上，明治维新以来，大量西方体育传入日本，日本将接受现代体育视为现代化或者说西化的路径。但是日本传统精神并未消失，现代体育以融入日本文化的方式被日本人接纳。同时，日本传统体育也受西方体育的影响，

开始走向改革。简言之,日本体育一直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发展,外来因素的作用不宜被夸大,本土力量也不能被低估。

以往中国近代体育史书写中,外来体育传入中国只被视为一个历史背景,往往被一笔带过。现代体育的引入与转译无疑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以往针对中国近现代体育史研究,大部分基于“民族-国家”视角。过往中国近代史的书写范式经历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冲击-回应”范式、“中国中心范式”、“社会-国家”范式与市民理论等^[10]。以上研究范式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具有不同特点,同时都有所不足。除了革命史研究范式之外,其他研究范式在如何处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从跨国视角,将中国体育置于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叙事中,一部不失民族特色的中国体育国际化道路清晰可见。徐国琦^[11]认为,现代体育在中国不仅扮演着社会变革的力量,还是国际认同、国家声望以及国家构建的引擎。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进路是一条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历史过程。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在地化过程,已经有不少专题研究,但还远远不够。

2 体育跨国史的理论主张

体育跨国史的研究假设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体育是全球民众共同塑造的历史过程与结果,挖掘这一人类共有的历史,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诠释。当前,全球保守主义回潮,现代体育的跨国传播是否会滋生文化霸权,是否会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学术界至今争论不休。各方争论的核心在于,接纳兴起于西方的现代体育是否就默认西方代表了现代与文明,而其他形态的文明只能甘拜下风。从体育跨国史的视角看,答案是否定的。

2.1 反击“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的滥觞是西方人对“文明”认知过程的结果。19世纪社会危机在欧洲频发,社会科学家开始关注现实,即同一民族在社会化进程中依照相同规范与准则,并且形成统一价值观,使之在社会生活中保持一致态度。换言之,现实的文明就是民族性,民族特性被视为稳固永恒的存在,因此各民族文明必是不变的,相互区隔的,各文明都是独立的“自我”,“自我”之外均为“他人”。Civilization一词于19世纪出现的复数形式,成为多元文明观的肇始。“欧洲中心论”形成的根源在于,近代欧洲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最先进入工业化社会,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使其觉得有资格居于“文明阶梯”的顶端。随着优势的扩大,这种文明优越与区隔的观念,构成欧洲殖民扩张、征

服世界的思想根基。

英国与美国是促成现代体育海外传播的重要代表。19世纪体育在大英帝国的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JA曼干^[12]认为,维多利亚时代出现的中产阶级以及公立学校是用体育塑造民族性格的重要推手。他们在奔赴各殖民地为英帝国尽职效忠的过程中,将英国的体育精神传播到殖民地上层。英国用体育作为连接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纽带,同时也是英国教化殖民地民众的手段之一。美国作为继英国之后接棒现代体育对外传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继承英国用体育教化异族的思想。英裔社会上层群体认为,体育可以教化黑人、印第安人以及其他少数族裔,使其更加遵守规则、有团队精神、产生更高工作效率,最为重要的是更加效忠权威^[13]。综上可知,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其体育思想中有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即认为只有接受西方体育才能实现现代化,西方文明有天然的优势。

但是,现代体育传播至世界其他地区之后,西方是否依然能够持续享有压倒性优势,是否取代地方体育的多样化,从跨国史角度审视,答案是否定的。现代体育兴起于西方,在传播过程中被广大非西方国家接受,地方传统体育不可避免受到影响这已是不争事实。随着学术界对现代化的反思,体育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争论焦点,即参与体育全球化进程是否意味着接受西方文明的主导进而导致丧失自我意识。正如阿尔让·阿帕杜莱^[14]所言,现在问题的核心是,全球互动究竟是一种文化同质化过程还是异质化过程。毋庸置疑的是,伴随着现代体育的普及传播,诞生于西方的现代体育标准、制度、理念、技术实现全球普及。假设依照全球化发展同质化的观点,认为现代体育对本土体育造成完全冲击,进而推断出西方文明代表了现代,其他地区的文明只能被迫接受。但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从不同程度论证体育的现代性并不全等于西方文明,并非是西化的普及。

安东尼·吉登斯^[15]指出现代性在外延上确立了跨越不同社会的连接模式,内涵上改变了民众日常生活最熟稔和最富有个人特色的领域。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全球化倾向,既是客观也是主观的,它们在地方和全球两极所发生的变迁的复杂辩证法中,把个人和大规模的系统联结起来”。按照吉登斯的阐释,新闻媒体对全球赛事的报道超越本土的地域范围,不论来自哥本哈根还是里约热内卢的热情观众能够共享体育赛事。此外,由于有了统一的时间概念,小到一场地方足球赛大到世界杯、奥运会都按照统一时间表进行。阿伦·古特曼^[16]认为,平等与成绩原则之间的关系是

极为重要的。现代体育的专业化、理性化、科层化也暗示着机会的平等,倘若最快的赛跑运动员或最有技术的击剑运动因为职业、肤色或者宗教而被禁止比赛,那么现代体育追求记录的特征是无法实现的。平等性在现代体育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每个人在理论上都有比赛的机会;其二,对于竞赛者来说比赛条件是同等的。概言之,现代体育的世俗、平等、专业化、理性化、科层化、量化、追求记录的特征相互关联,平等性是重要保障。

古特曼^[17]指出导致现代体育传播的向量中,政治、经济、文化是 3 个主要维度,现代体育的传播速度以及范围是三者合力的结果。但古特曼认为,文化维度是核心,模仿意识是动力。当现代体育在政治、经济的裹挟下与传统社会相遇,现代体育看似占据文化上风。但是,非西方国家在模仿过程中,会产生“用你们的游戏战胜你们”的心理。当模仿者用外来体育战胜外来者,会进一步促进这些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与变革。换言之,接受现代体育是实现国家构建的路径。质言之,不同社会在对现代体育从模仿、适应、改造直至挑战,是现代体育传播的根本动力。

2.2 否定“文明例外论”

“文明例外论”观念同“欧洲中心论”一样,有深远历史与文化来源。以美国为例,基于理念与民族渊薮,美国长期以来既把自己看成一个国家,也视为一项人类伟大的事业。对美国人来说,例外主义代表了某种道德优越感或者是基于共同合作且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公民理想爱国主义。斯坦利·霍夫曼^[18]曾经指出,每一个国家都喜欢把自己视为独特的,法国和美国在信念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认为他们的价值是普适性的。但是法国追求的目标是有限的,仅限于欧洲均势,而美国试图发展反映例外主义的外交政策,并且拥有付诸实践的能力空间。概括来讲,美国的“文明例外论”从人文、地理上来讲,有以下 3 个来源:其一,可以追溯到《圣经》里面关于“天选之人”的宗教根源,那些离开英国的新教徒希望在新世界以更加纯洁的方式崇拜上帝。其二,缔造美利坚合众国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美国革命以及美国宪法被视为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实践。其三,美国特殊的地理位置。美国被两大洋保护,与弱小的国家为邻,使其能够在 19 世纪进行“西进运动”,获得发展的空间和完成资本原始积累。

19 世纪末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发表了著名的《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在美国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特纳的演说否定了美国历史欧洲生源论,认为美国的精神来源于开拓边疆之锻

造,美国的历史从边疆中诞生,确立美国“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价值观。在历史的发展中,上述观念不断深化,加深美国人对美利坚民族发展“例外论”的深信不疑,加之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社会发酵,形成白种人、盎格鲁-萨克逊血统、清教主导的社会观,成为美国“文明例外论”的思想内核。

现代体育的诞生,如果从民族国家的视角考察,是一国人文、地理、历史发展塑造的结果。体育跨国史并不否认这一历史事实。但跨国史否定的是以人文地理为依据而形成的狭隘“文明例外论”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文明优越论”。

马克·戴伦森^[19]提出美国“体育共和国”的概念,认为在南北战争之后,再无任何力量能够实现美国社会在阶级、种族、民族、性别问题上的大幅度改进,体育承担起政府所无法实现的维护美国社会平等、焕发民主活力、提升道德水准的社会功能。但是,美国这一体育观念的形成,离不开两个外来因素的影响:其一,深受英国公学体育塑造品格思想的影响;其二,深受欧洲奥运会竞技体育思想的影响。受到《汤姆布朗的学校生活》以及基督教“强身派”思想的影响,美国公众愈发意识到学校体育对人格塑造的价值。伴随着大学在美国的兴起,橄榄球被视为锤炼青年意志品质的重要手段。以耶鲁大学为例,曾多次与英国大学进行比赛。在双方的比赛交流中,美式足球的规则逐渐确立^[20]。由此可见,美式足球的早期历史是一部跨国交流史。吊诡的是,在后来项目发展中,正是美国刻意追求与强调这项运动的“美国身份”,导致其与同时期的英国足球无法竞争,最终导致美式足球未能成为一项全球普及的运动。19 世纪后半期以来,以体育为文明载体的海外传播更多呈现出美国强势出击的态势,“互动”一说似乎牵强。但是,美国体育在遭遇劲敌之时,不自觉受到外界影响。冷战时期,苏联数次在奥运会奖牌榜上力压美国。针对这一问题,美国国会议员多次呼吁政府要对运动员进行资助。不仅如此,为在 1952 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显示实力并战胜苏联,很多运动员来自美国陆军,这完全是对美国所宣扬的“业余主义”的背离^[21]。事实证明,冷战时期奥运会的竞技比拼对美国体育传统造成的冲击是多方面的,在制度、宣传、认识上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总而言之,体育跨国史反对从现实出发,反推合理性与必然性的历史思辨逻辑,即反对以欧美国家处于体育强势地位的现实为前提,苦心孤诣论证西方强大的特殊性。体育跨国史意图通过从更大空间、更长时间段,论证西方与外界的交往和依赖才是西方体育获得发展的动力。

3 体育跨国史的方法实践

全球意味着普遍,而地方意味着特殊,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是体育跨国史的核心议题。在全球化时代,全球与地方之间存在内在的辩证关系。某种程度上讲,全球的可以成为地方的,地方的也可以成为全球的。

3.1 揭示体育项目多元文化来源

现代足球作为兴起于英国的运动,是世界上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的运动,国际足联在国际体育界地位仅次于国际奥委会。目前,欧洲仍然是足球运动发展最繁荣的地区,是世界顶级豪门俱乐部以及顶尖运动员的汇聚之地。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完全掌握这项运动的话语权?如果从体育跨国史的角度考察世界足球的发展,答案是否定的。足球自欧洲传入拉美后,受到极大欢迎。1924年乌拉圭获得奥运会足球冠军,在对阵瑞士的比赛中,3:0锁定胜局,技惊四座。彼时一统国际足坛有两个流派:一是英国流派,被誉为大陆派;一是多瑙河派,球员主要来自于奥地利和匈牙利。乌拉圭在控球和传接球方面的精彩表现,彻底改写欧洲一统天下的局面。1930年在很多欧洲国家并不赞成的情势之下,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首都举行^[21]。事实表明,正是拉美国家的足球实力使欧洲人占主导的国际足联不得不协调与拉美国家球队的关系,而恰是拉美足球俱乐部的支持,帮助国际足联度过战争时期的艰难岁月。

棒球作为一项兴起于美国纽约市的运动,其本身有浓厚的田园倾向。棒球是“一个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广阔绿草坪上进行的项目”成为棒球文化的显著特征^{[16][13]}。可见,棒球文化的诞生根源与美国人文历史和地理特征密切关联。美式足球这项美国大众所狂热的运动,在美国以外地区受欢迎程度远不及美国,似乎更加论证了美国文化“例外论”。但是,通过体育跨国史研究发现,美国棒球文化或是美式足球文化都不是在真空的环境中进行,而是通过跨国交往形成的结果。日本棒球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得益于与美国的交往,但是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武士道棒球”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日本棒球的本土化成绩斐然。在体育全球化的促进下,美国职业棒球开始引进日本选手,他们将日本棒球文化与棒球技术带到美国本土^[23]。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中国台湾地区的棒球曾在日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二战以后,台湾地区的棒球成绩令人瞩目。事实上,根据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棒球自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不仅开始在美国南部传播,同时也开启了跨越太平洋之旅途,日本、中国、菲律宾、韩国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成为这一文化网络中的

成员^[24]。时过境迁,如今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亚洲面孔已不再陌生,他们在这一顶级赛事中磨练技术,“外来者”的身份并没有阻挡逐梦筑梦的步伐。可见,美国棒球已是一项融合多元文化的运动。

总而言之,学者可通过使用多国、多层档案材料,证明西方体育大国、强国并不是因为人种、文明的优越性,从长时段观察,也不存在体育项目上拥有绝对权威。这对于深入历史纵深理解全球体育具有极强现实意义。

3.2 构建全球体育文化网络

体育跨国网络的形成既是体育跨国行为的原因亦是结果,是跨国史研究富有潜力的领域。1998年法国世界杯决赛中,法国队的成员大多是非洲裔,这一现象引发法国保守政客的不满。在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上,归化运动员谷爱凌的成功一度在美国媒体引发争议。目前,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从不同角度解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体育移民问题。约瑟夫·马奎尔认为,在体育全球化的影响下,体育移民的影响因素呈现出多元特征,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国际体育组织的影响力增强。这些组织对运动员权利意识的培养是刺激职业运动员跨国流动的根源。但无可置否的是,职业运动员的跨国流动是一个涉及到移民管控、自由市场、现实政治、民族路径的复杂课题^[25]。究其根本,这是一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全球与地方、西方霸权与反西方霸权的较量。

事实上,伴随着体育全球化程度加深,运动员产生多重身份认同,突破以往各种定义的束缚,改造身份认同政治的环境。人员的全球流动将会创造许多全新、过去无法想象的身份认同形式。近年来,以跨国史的视角进行移民和离散社群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与移民研究最为关注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统计等方面的问题不同,离散社群研究关注更多是大范围移民带来社会和文化层面的问题,尤其是侨民区及其后代与母国、寄居国之间的关系问题^[26]。孔飞力^[27]对近代海外华人的研究表明,亲情和乡情是异域谋生的重要依靠,在母国与移民国之间以守望相助的方式,维系一条移民的“通道”。“维持一个以同乡为基础的小生境,意味着维持与老家之间文化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通道。在中华帝国晚期,此类通道,即金钱的、社会的与文化的繁忙路径,可谓纵横交错。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通道,远在他乡的移民通过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情感共享,而与自己的老家紧紧相连。它们既是一种联系纽带,也是一种文化生活空间”。概言之,跨国史视角下的移民研究认为,海外移民或离散群体在情感上保持着与故乡的联系,拥有一种对故乡的集体记忆,并且怀着

一种有朝一日能够回到故乡看看的向往。

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关注通过体育交流在母国和移民国之间形成的跨国纽带,可被视为体育全球网络构建的路径之一。以19世纪中后期棒球的全球传播为例,彼时在“淘金热”的吸引下,很多中国人怀揣“美国梦”远赴美国。这些在西海岸或者夏威夷的华工为融入美国社会,开始学习打棒球并组建华人棒球队。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主流社会潜在的同化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华人构建身份认同的一种途径^[28]。但是,很少有历史学家关注到,这些来自美国檀香山的华人曾数次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甚至还斩获棒球锦标赛冠军。1927年根据《申报》记载:“中国棒球队,因檀岛健将出席代表,在远东运动会中,一跃成功而为第二,成绩惊人。适有万国公开锦标之举行,复行加入,昨以三小时之久,连胜美国及菲律宾二队,一举成功,奋得锦标,是大可庆幸者也,不可不记。”^[29]可见,华人与母国的感情纽带是支撑起他们为母国出征的动力。

在美华人华侨为母国效力并非孤例。中日建交前后,在旅日华侨棒球选手王贞治的支持下,中日关系不断升温^[30]。这是体育外交又一成功案例。棒球的这种交流无疑形塑了这项运动在中国的成长路径。有学者甚至认为,作为一种带有美国特征的运动,棒球在新中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体育外交”附加功能^[31]。除外交功能之外,海外华人华侨体育人回馈侨乡的行为,进一步说明体育跨国史的真正意涵,即以体育促进彼此经济、文化、政治的全面社会交往。概言之,一部完整的中国体育史应具备国际视野,海外华人华侨的奋斗史以及体育爱国行为不应被忽略。

总而言之,在体育跨国史的书写范式下,跨国体育行为不仅仅涉及商业流动、身份政治,其背后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对母国的眷恋是切实到每个历史个体的真实存在,不应被大历史叙事湮没。

3.3 关注体育在地化转译的过程

体育跨国史关注各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差异性以及这些差异产生的历史原因。在地化过程中,民族国家赋予体育更多重的价值,体育与所在国家的文化深入融合,实现体育文化的转译,与最初传播现代体育外来动机相比,民族国家将外来体育转译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政策手段、一种身份象征。

伴随西方殖民主义扩张,西方的制度、思想、语言以及物品先后涌入中国,某种程度讲重塑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现代体育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之初带有明显西方文化特征。但从进入中国后,就开始转译而非复刻历史进程。现代

体育在中国传播初期,很多体育专业用语都是英文并没有对应的中文,连观看比赛的观众也使用英文。毛岸俊指出:“语言上的模仿成为中国与西方的共性,为中国青年营造了摆脱过去,拥抱体育精神、公平竞赛精神,走向未知西方世界的途径。”^[32]最初的模仿过后,现代体育在近代中国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语境下开始走向独立,现代体育在近代中国普及的过程中,催生了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观念。但毛岸俊对西方体育内化为中国文化缺少历史细节变化的考察。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近代中国对西方体育从器物乃至制度上的拥抱,背后均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且民族情感强烈,拥有将西方体育文化在地化的能力。实际上,这些研究依然是站在民族国家的角度。

张宁^[33]在《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中,突破民族国家的研究范式,将体育(休闲运动)看成一种文明互动的过程,首次提出了体育文化“转译”概念。她认为过去学界多汲汲于西方文化如何被引介,忽视转译过程中产生的幽微变化,或者虽然观察到若干变化,却视之为理所当然,仅仅以简单的“本土化”予以描述,而没有继续追究其背后的原因。“转译”,指的是英语中的 translation,有蕴含的“背离原意”之意,即是中文的“译”,更包含如 transfer、displacement、metaphor 的“转”或“变”。西方体育传入中国实质上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纳与转化。这一转化并不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然,其方向与程度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拉锯的结果,不同文化不断进行的协商,以及在协商中虽不完全背离原意,却又必然会出现的扭曲。这一转化的过程,就是体育的“转译”,在不同阶段,它同时包括“转化”“演变”“本土化”“异化”等多种意思。实际上,体育文化发生转译的根本在于“流动性”,即空间范围上文化在东西方的流动,以及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化,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徐涛^[34]考察自行车从传入中国到普及的历史。研究表明,以“卫乐园自由车竞赛”为代表的博彩商业比赛,是近代中国唯一以自行车运动为主要看点的售票商业运动会,既有西式表演又夹杂有赌博色彩,不仅沪上名流趋之若鹜,带有商业性质的表演也引起国民政府的关注,在中国自行车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概言之,体育在地化转译产生不同以往的文化场景,既有别于西方,也不同于过去。

4 体育跨国史与体育全球史的比较

4.1 体育跨国史与体育全球史的相同之处

体育全球史同样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固守文

明中心论,是对多元价值体系缺乏公允的评价。“互动”是体育全球史的核心理念,是对参与体育交往多元主体的尊重与认可。构建体育文化之网是体育全球史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恰切关怀^[35]。概言之,体育全球史是人文地理概念,绝不是单纯地域体育叠加,而是在全球史观指引下历史因果解释体系,体育全球史拒斥任何将全球体育的传播视为同质化或者西化的结论。长久以来,西方人眼中的全球化就是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化,现代化是西方人手持“文明”和“理性”权柄教化“他者”的过程。体育全球史以超越体育解读大历史的意图,旨在构建体育文明之网。正如麦克尼尔^[36]在《人类之网:鸟瞰历史世界》中所言,人类之网是把人类相互连接起来的一系列关系。通过这些联系,人们彼此之间传递信息、技术、物品、思想观念,人们可能还在无意中传播疾病。但正是这些交流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做出的反应,塑造了人类的历史。质言之,体育全球史旨在论证体育文化的交往与互动构建出人类文明之网。在体育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不存在体育文明高下比较。

按照学界惯例,一般将全球史和跨国史放在一起讨论,原因在于:其一,两者的研究视野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物理边界,一些跨国现象成为最佳研究对象。例如,人员的流动、技术的传播、疾病的蔓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其二,两者反对任何形式“文明中心论”,认为任何文明都不能主导一切,主张对文明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其三,两者反对任何形式“文明例外论”,认为任何国家地区的发展固然有地方特色,但绝非是在完全封闭的时空中自行生长,外来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质言之,两种研究范式都认为人类因交往而形成网络,人类社会构建起来的制度、文化都在这个网络之中。其四,两种研究范式有相似内容,即跳出“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凸显体育的跨文化属性,关注体育文化的全球流动以及在地化过程;两种研究范式有相似研究旨趣,即强调体育文化的多元性。总而言之,体育全球史与体育跨国史既不是要对全球体育进行同质化处理,走“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老路,也不是要消解民族体育的独特性,而是要在全球人类文明交往的视野之下,描绘更加真实、完整的人类体育发展历史,从体育跨文化传播视角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

4.2 体育跨国史与体育全球史的不同之处

尽管体育全球史与体育跨国史有相同的研究旨趣,但仔细推敲,两者还是存在差异。其一,研究空间范围略有差异。全球史研究的对象可以追溯到航海时期,而跨国史的研究时间范围则是以威斯特伐利

亚条约签订后,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为起点。但就现代体育而言,自19世纪开始向欧洲以外地区传播,因而在时间上体育全球史与体育跨国史并无差异。但是在空间上,体育跨国史认可所有的体育跨国行为,并没有对空间范围有所要求,既可以是双边、地域的也可以是全球范围内的体育跨国交往;而体育全球史关注体育全球流动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与结果。其二,研究内容略有差异。全球史研究强调一项具有跨文化、跨国属性的现代体育如何构建全球网络的历史过程,跨国史研究更多强调现代体育传入对民族国家的影响,是对民族国家历史的修正与补充。如果说反“欧洲中心论”是全球史原则上遵循的宏大话语,那么跨国史所关注的跨文化互动或者变迁则是一种可用于具体问题研究的中层理论,将视界从“栖身月球的观察”转移到“人际互动的观察”,使全球史研究具有可操作性^[37]。

综上所述,体育全球史以现代体育的全球传播为视角,关注人类社会如何通过体育连接成一个网络;体育跨国史以民族国家为考察对象,关注跨国体育行为引发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变革。简言之,前者强调体育全球传播的动力与路径,后者凸显外来体育对民族国家的作用。事实上,体育全球史与体育跨国史并不冲突。全球体育网络的形成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参与和支持。此处,可将体育与棉花的全球传播历史进行类比。正如《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的历史》作者斯文·贝克特^[38]所言:“在资本主义的大部分历史中,全球化的过程与民族国家的需要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相互冲突,而是彼此加强。”但是,体育与棉花的全球传播最大不同在于,体育虽然同样借力于国家的力量,但是体育在地化过程中培植出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一部民族国家成长史而非一部资本主义剥削的暴力胁迫与屈辱的血泪史。究其根本,体育是一项特殊的人类活动,这也突出体育全球史与体育跨国史的体育学特征。

自19世纪中期专业史学兴起以来,历史学最重要使命是重建民族国家的经历,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培育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也就是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服务,未来历史学仍继续履行该职责。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仅仅服务于国家构建的目标远远不够,历史学者不仅要负担寻找历史真相的使命,还应致力于促进跨文化理解与培育世界主义观念,以此培育相互合作、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全球共同体意识^[39]。跨国史研究为解决以上问题提供有利历史视角。目前,跨国史研究已形成一股强劲学术潮流,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正如历史学

者于沛^[40]所言：“任何一个独立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既包括本民族历史，也包括对其他民族及整个世界的历史——全球史的认知和判断”。目前历史学的主流范式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这表明西方近代史的研究范式仍然具有全球影响力。但已经有学者尖锐指出，这一范式“必然会走向式微，而为跨学科、多视角的学术气候所取代。这一取代并非追求时髦、刻意翻新，而是近几十年来国际学术界挑战、质疑和扬弃西方中心论的有机组成部分”^[41]。尽管，目前学术界针对两种学术范式依然存在争论，但我们不断探索构建史学的脚步从未停歇，21 世纪或许尤甚。史学将会继续服务于建设民族国家与塑造身份认同。与此同时，我们也日益深切认识到，无论过去与未来，人们不仅彼此之间而且与其他物种之间共同拥有同一个星球。因此，跨国史是未来史学研究的可行方案之一。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概念与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导致中国学术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无法跳出西方的理论框架。要真正打破这一学术制约，需要学术界做出两方面工作：一是深入研究西方知识形成的历史，包括概念的产生、理论的传播、学术影响力的形成过程；二是总结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经验，在根本上解构“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同时，借鉴有益成果，服务中国特色学术体系构建^[42]。跨国史的研究范式，客观上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是具有扎实的世界史研究基础；二是研究具有国际视野；三是研究人员需要具有多国、多语种档案的阅读、理解能力。需要特别指出，对于方兴未艾的跨国史研究，中国学术界要保持警惕，既不能目空一切，也不能妄自菲薄，要做到真正实现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中国化。“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借鉴外邦文化，但同时要保持民族的主体性、独立性。必须资外以宏内，不能徇外而灭内”^[43]。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44]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体育史研究的脉络自 20 世纪初在中国初现，伴随时代发展，在历史的经纬中坚韧成长。学界前辈筚路蓝缕的学术探索精神需要年青一代学人去继承并发扬光大，新时代要求我们要有世界眼光，发掘体育这一人类共有文明内涵。

参考文献：

- [1] 王立新. 跨国史的兴起与 20 世纪世界史的重新书写[J]. 世界历史, 2016(2): 4-23.
- [2] 林恩·亨特. 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M]. 赵辉兵,

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7: 3.

- [3] 威廉·麦克尼尔. 西方的兴起: 人类共同体史[M]. 孙岳, 陈志坚, 于展,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5: 3.
- [4] TYRRELL I.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an age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J]. *The American History Review*, 1991, 96(4): 1031-1055.
- [5]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s. The LaPietra report: A reports to the profession[R/OL]. [2022-01-03]. [http://TheLaPietra Report: A Report to the Profession | OAH](http://TheLaPietraReport: A Report to the Profession | OAH)
- [6] 托马斯·本德. 万国一邦[M]. 孙琇,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1.
- [7] IRIYE A, SAUNIER P Y.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26-36.
- [8] 王立新. 在国家之外发现历史: 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与跨国史的兴起[J]. *历史研究*, 2014(1): 144-160.
- [9] GUTTMANN A, THOMPSON L. Japanese sports: A history[M].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7-8.
- [10] 崔志海. 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与方法再检讨[J]. *历史研究*, 2020(3): 201-218.
- [11] XU G Q.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1895—2008)[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4.
- [12] MANGAN J A. The cultural bond: Sports, empire, society[M]. New York: Routledge: 3.
- [13] GEMS G R. The athletic crusade: Sport and American cultural imperialism[M].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8: 108-109.
- [14] APPADURAI A.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J].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90, 7(2-3): 295-310.
- [15]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54.
- [16] 阿伦·古特曼. 从仪式到纪录: 现代体育的本质[M]. 花勇民, 钟小鑫, 蔡芳乐, 译.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12.
- [17] GUTTMANN A.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s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84.
- [18] 约瑟夫·奈. 美国总统及其外交政策[M]. 安刚, 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2022: 2.
- [19] DYRESON M. Making the American team: Sport, culture, and the Olympic[M].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15.

- [20] COLLINS T. Unexceptional exceptionalism: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football in a transitional context[J].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13(8): 209-230.
- [21] DOMER T M. Sport in Cold War America, 1953-1963: The diplomatic and political use of sport in the Eisenhower and Kennedy administrations[D]. Milwauke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1976: 16.
- [22] DIETSCHY P. Making football global? FIFA, Europe, and the non-European football world, 1912-74[J]. *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 2013(8): 279-298.
- [23] COLLINS S. 'Samurai' politics: Japanese cultural identity in global sport-The Olympic Games as a representational strategy[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s*, 2007, 24(3): 357-374.
- [24] GUTHRIE-SHIMIZU S. Transpacific field of dreams: How baseball link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in peace and war[M].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2: 7-9.
- [25] MAGUIRE J. 'Real Politic' or 'Ethically Based': Sport, globalization, migration and nation-state[J]. *Policies, Sport in Society*, 2008(11): 443-458.
- [26] BENTLEY J H. The new world history [G]//KRAMER L, MAZA S. A companion to western history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2002: 39-416.
- [27] 孔飞力. 他者中的华人: 中国近现代移民史[M]. 李明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41.
- [28] YU X W. "Let's Cut Queues and Play the Games":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involvement in American baseball, 1870—1935[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2017, 34(12): 1231-1246.
- [29] 远东大会特刊[N]. 申报, 1921, 1(3): 421-422.
- [30] 沙青青. 从另辟蹊径到顺势而为: 棒球运动与中日体育交往互动关系初探[J]. *体育与科学*, 2021, 42(1): 18-23.
- [31] 沙青青. 在新中国打棒球: 一项体育运动的境遇变迁及其多重角色[J]. *中共党史研究*, 2014(2): 45-54.
- [32] MORRIS A D.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 Chin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55.
- [33] 张宁. 异国事务的转译: 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4-6.
- [34] 徐涛. 自行车与近代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73.
- [35] 王邵励. 什么是“体育全球史”? [J]. *体育学刊*, 2019, 26(4): 1-7.
- [36] 约翰·R·麦克尼尔, 威廉·H·麦克尼尔. 人类之网: 鸟瞰世界历史[M]. 王晋新, 宋保军,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 [37] 刘文明. 中国全球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 *史学理论研究*, 2021(6): 91-102+159-160.
- [38] 斯文·贝克特. 棉花帝国[M]. 林添贵, 译. 台北: 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7: 12.
- [39] 王立新. 有思想的历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8-10.
- [40] 于沛. 全球史: 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J]. *史学理论研究*, 2006(1): 18-30.
- [41] 王晴佳. 超越国别史的研究模式[J]. *历史研究*, 2020(4): 36-45.
- [42] 陈恒. 学术全球化时代如何推进中国世界史研究[J]. *探索与争鸣*, 2020(6): 43-50.
- [43] 张岱年. 文化与价值[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253.
- [44]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2016-05-18)[2022-02-05].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